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第二个十年

(1988—1998)

理论·政策·实践

资料选编

主编 沈冲 向熙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第二个十年(1988—1998):
理论·政策·实践——资料选编

主编 沈 冲 向熙扬

(第十一卷)

对外关系

任 青 编
姜长斌 编审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第二个十年 (1988—1998): 理论·政策·实践资料选编/沈冲, 向熙扬主编. —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8. 11

ISBN 7-5035-1914-2

I. 党… I. ①沈…②向… II. ①中国共产党-党史-史料-1988-1998②社会主义建设-史料-中国-1988-1998 IV · D23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36941 号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海淀区大有庄 100 号)

济南印刷四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8 年 12 月第 1 版 199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259.22

字数: 6731 千字 印数: 1—3000 册

全套 (12 卷) 定价: 680.00 元

序

《第二个十年（1988—1998）：理论·政策·实践——资料选编》在许多热心朋友的支持与帮助下，作为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20周年的献礼，与广大读者见面了。在《十年来：理论·政策·实践——资料选编》（1988，求实出版社出版）之后，继续做第二个十年的选编工作，是十分关键的一步，因为，有了第二个十年这一步，顺理成章，就应该有第三个十年，第四个十年……，直至走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整个历史进程为止。虽然，这件事情完成之日，我们都不在了，但是，如果它是有意义的话，我们想，必然会有热心人去完成它，也必然会有热心的读者去使用它。因此，对这“第二个十年”的出版，我们感到特别的欣慰，觉得这是一种历史行为，是我们应尽的历史责任。

在掏出这一席肺腑之言后，似乎有必要向读者介绍一下选编这套资料书的缘起。这样，就只好多说几句，把历史的镜头转回到20年前了。

那是在真理标准讨论刚刚揭开序幕的时候，我们被召唤到中央党校任教。这里是结束“文化大革命”之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舆论中心。我们来到这里，与其说是任教，不如说是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再教育更为贴切。因为，众所周知，自50年代后期开始，特别是经过了“文化大革命”那场浩劫，理论是非已经被颠倒了。复办之后的中央党校，肩负着把颠倒了理论是非重新颠倒过来的历史重任，而当时主持工作的胡耀邦，果然不负重望，他与党校的同志们一起，以真理标准的讨论为突破口，点燃了解放思想之火。我们来到党校时，虽然胡耀邦已调中组部工作，但他仍任这里的党委书记。我们很快受到解放思想的气氛感染。接

着，就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此，我们更加自觉地沿着真理标准讨论开辟的道路，义无反顾，一直往前走。

中央党校是党的最高学府，与普通高校不同，在这里接受培训的学员，都是党的一定层次的领导干部。他们不仅要懂理论，还要熟悉党的政策，乃至参与政策的制定，而且还要带领群众去实践。因此，如何把理论、政策、实践有机地结合起来，便是在教学过程中要着力解决的一个问题了。十二大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走自己的道路”这个时代课题之后，我们更感觉到把理论、政策、实践联系起来加以考察，是十分重要的一环，基于教学的需要，我们开始着手做一些资料积累工作。

1985年，历史给了我们一次难得的机遇。从这一年开始，中央党校培训部连续两年招收了学制三年的战略后备干部培训班。这批学员是恢复高考后大学本科毕业的优秀学生，且经过两三年的基层工作锻炼，具有良好的政治、理论、文化素质，完全有条件组织起来进行课题研究。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主题，着眼于对社会主义的再认识，进行理论、政策、实践的资料搜集与整理。这个课题，就是当时选定的课题之一，它是由86级中哲学专业毕业的十多位学员承担的。其成果，便是《十年来：理论·政策·实践——资料选编》这套八卷本的丛书。

这项工作进行的过程，并不一帆风顺，这期间，政治生活中发生了一些始料不及的变化，按“常规”，这套书稿，很可能被搁置一旁了。好在中央党校科研部的同志能够用历史的眼光去处理问题，使这套书按原计划作为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十周年的献礼，如期出版。第一次印刷了4000册，很快告罄。这对于我们不能不说是很大的鼓励，觉得这件工作似乎可以继续做下去。

1989年，也就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第二个十年的头一年，一场始料未及的政治风波发生了。尽管邓小平在风波前后三次讲话中，一再申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的路线方针政策没有错，

“十三大一个字都不能动”，但是，企图动摇十三大的事却频频出现，甚至连“对社会主义的再认识”这个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命题，也被看作对社会主义亵渎的异端邪说而受到批判。十三大所取得的理论成就，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生产力标准理论等等自然也在非议之列了，至于市场经济呢，更被看作是反对社会主义，否定共产党领导的东西。姓“资”还是姓“社”的诘难，公然频频见诸报端，前景如何，不能不引起人们的疑虑。

1992年春，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发表了，顿时，疑云尽散。“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如雷贯耳，使我们眼睛为之一亮。第一个十年资料选编的基调抓对了，这件事不仅可以做，而且应该认认真真地做下去。

这时，参加第一个十年选编工作的年青学子们，已经劳燕纷飞，不可能再集中起来继续做第二个十年的资料选编工作了。好在得到中央党校图书资料中心的同志们热心相助，他们拥有大量资料，信息灵通。一些同志愿意参与这项工作。于是，一支以图书资料中心人员为主体的选编队伍组成了。为了保证选编质量，各分册还特别聘请了有关学科的专家担任编审工作。

在第二个十年即将结束之际，邓小平与世长辞了，邓小平之后的中国往何处去？十五大作了明确的回答：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这是多么振奋人心！我们的资料选编工作，将沿着历史的轨迹继续前进。

从第一个十年到第二个十年，我们的资料选编工作所以能够取得一定的成果，确实得到了各个方面的相助。否则，纵然有良好愿望，也是寸步难行的。

我们要感谢朱厚泽同志，他对我们的工作一直给予支持与鼓励。我们还要感谢德高望重的李昌同志、杜润生同志、于光远同志，他们热心关怀和支持我们的工作，并亲自为我们提供了他们在这个时期有代表性的论著。

我们还要感谢承担本书各分册编者和编审工作的同志们，没有他们的热情相助，这套书的质量是难以得到保证的。

我们还要感谢本书众多的订户和广大读者对我们的支持和理解，但愿这套书能够从他们所需要的角度上给他们以启发与帮助。

.....

北京的七月是炎热的，但当我们想到这套资料书的选编也许算得上是尽了一份历史责任时，就像一股清泉流淌过心田，烦闷尽散.....

沈 冲 向熙扬

1998年7月于中央党校

编辑说明

为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20周年,我们在《十年来:理论·政策·实践——资料选编》(8卷本)基础上,又续编了这部资料丛书。

这部资料以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主题,着眼于改革开放,所选资料力求做到具有全面性、客观性、针对性、代表性和典型性。共12卷。参加各卷的编辑人员是:第一卷,《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向熙扬编;第二卷,《农村改革》,张久义、岳扬编,肖云编审;第三卷,《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战略》,林娜、张文玲、黄根兰编,臧志风编审;第四卷,《对外开放》,周隆镜编,周文彰编审;第五卷,《科技和教育体制改革》,陆苏娅、沈黎萍编;第六卷,《民主和法制建设》,刘俊瑞、王文生编,黄子毅编审;第七卷,《政治体制改革》,陆苏娅、沈黎萍编,王仲田编审;第八卷,《“一国两制”》,陆苏娅、沈黎萍编,毛卫平编审;第九卷,《精神文明建设》,龚晓英编,魏华编审;第十卷,《民族、宗教》,史小平编,肖文编审;第十一卷,《对外关系》,任青编,姜长斌编审;第十二卷,《加强党的建设》,魏小兰、王力力编,王长江编审;《结束语:世纪的回顾与展望》,向熙扬编。由于这十年的理论、政策、实践极其丰富,限于我们的水平,同时也限于篇幅,难免挂一漏万。我们祈望读者和各有关方面的同志给予批评、指正。

这部资料的选编工作量很大,选编过程中得到中央党校图书资料中心、中央党校机关党委的领导和有关同志的支持和协助。董节英同志参加了第三卷的部分选编工作;常友寅、由迪、翟迎春、白松等同志做了一些资料工作。在此一并致以谢意。

这部资料丛书收选了诸多作者的论著,对此我们表示深切的谢意。如对编辑工作有何要求,请与出版社编辑部联系,谢谢合作。

主 编

1998年7月

目 录

概 述.....	(1)
一、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11)
二、改善和发展同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	(94)
三、努力加强同发展中国家的团结与合作	(129)
四、积极发展同东欧、中亚各国的关系.....	(156)
五、重视发展同发达国家的关系	(229)
1. 中美关系	(229)
2. 中日关系	(353)
3. 中国与欧盟及其他发达国家的关系.....	(386)
六、广泛展开多边外交活动	(446)

概 述

十年来,我国政府在冷战结束后国际形势复杂多变的情况下,根据邓小平同志对国际形势的精辟分析,制定了正确的外交战略方针,全面开创了中国外交的新局面,特别是90年代以来,我国外交非常活跃,取得了丰富成果。在这一时期中,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关系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得到普遍改善和发展,特别是与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进一步巩固,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大为加强;与此同时,我国对国际上侵犯我国主权,干涉我国内政的行为进行了坚决斗争,有效地维护了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我国的国际地位和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日益提高和增强。目前中国已同世界上160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

这部分资料共分为六部分,概述如下:

一、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十年来,面对错综复杂、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在邓小平外交战略思想的指导下,我国始终坚定不移地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在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世界上所有国家建立和发展外交关系,开展经济、科技和文化的交流与合作。

我国政府一贯主张,应该本着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建立国际新秩序,主张各国有权根据本国国情,独立自主地选择自己的发展

道路，别国无权干涉，反对在国际交往中把自己国家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强加于别的国家；主张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都是国际社会的平等成员，反对任何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反对任何国家以民族、宗教、人权等问题为借口干涉别国内政；主张以和平方式解决国家间的一切分歧和争端，通过对话协商增进相互了解和信任，通过多边、双边协调合作逐步解决彼此间的矛盾和问题。这些主张既符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也适应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潮流，是我国外交政策的基本方针。

二、改善和发展同周边国家的 睦邻友好关系

中国始终重视建立和加强与周边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1988年9月，中国国家主席杨尚昆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参加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建国40周年庆典，并进行了友好访问。1990年3月江泽民总书记对朝鲜进行了正式访问。朝鲜国家领导人金日成先后于1989年11月和1991年10月访问中国。在中朝两国高层互访频繁，两国人民传统友谊不断加强的同时，我国政府也逐步改善了与韩国的关系，1992年8月中韩正式建立外交关系，9月，韩国总统卢泰愚访华。1993年11月江泽民主席在亚太经合组织西雅图会议上与韩国总统金泳三首次会晤，1995年11月又对韩国进行了成功的访问。中韩睦邻友好关系的确立和发展，不仅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有利于朝鲜半岛局势的缓和与稳定。1989年中国与蒙古人民共和国实现了关系正常化。次年5月蒙古领导人奥其尔巴特正式访华，揭开了中蒙友好的新篇章。

中国也十分重视发展同东南亚各国的关系。1988年11月，李鹏总理访问泰国时，宣布了中国发展同东盟各国关系的四项原则。1990年8月，中国与印尼两国在断交23年后正式恢复外交关系，同年10月3日，中国与新加坡签署了建交公报。1991年11月，越

南高级代表团访华，中越两国关系实现了正常化。1994年11月，江泽民主席访问了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越南，进一步加深了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友谊。1995年中国重申就南沙群岛问题提出的“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方针，以及根据公认的国际法和现代海洋法，通过和平谈判求得公平合理解决的主张，得到东南亚有关国家的积极响应。中国同巴基斯坦、印度等南亚国家的友谊与合作也在不断发展。1990年5月万里委员长访问了巴基斯坦，同年12月李鹏总理应邀访问了斯里兰卡。1991年李鹏总理访问印度，这是时隔31年之后中国总理对印度的正式访问。1993年9月印度总理拉奥对中国进行了友好访问，访问期间，两国政府正式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印度共和国政府关于在中印边境实际控制线地区保持和平与安宁的协定》。

三、努力加强同发展中国家的 团结与合作

加强同发展中国家的团结与合作是我国外交政策的基本立足点。十年来，中国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等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关系进一步加强。1991年杨尚昆主席访问了伊朗，李鹏总理访问了中东、海湾六国。1992年9月，中国同以色列建立外交关系，这标志着中国与所有中东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同年12月，以色列总统赫尔佐克访华，中以友好合作关系有了新的发展。1993年6月至7月，李岚清副总理访问了科威特、巴林、沙特阿拉伯、卡塔尔、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伊朗和阿曼等海湾七国，并分别同七国签订了贸易、投资、技术合作等协议。中国与非洲各国高层互访频繁，中国支持非洲国家维护国家主权，反对外来干涉、自主选择发展道路和模式。1992年6月，杨尚昆主席出访突尼斯、摩洛哥和科特迪瓦三国，并阐述了中国同非洲国家发展关系的六项原则。1994年，埃及、刚果、肯尼亚、扎伊尔等非洲国家的总统

先后对我国进行了成功的访问。1992年6月，李鹏总理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参加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首脑会议期间，与巴西、古巴、墨西哥、阿根廷、智利、秘鲁等拉美国家的领导人进行了会晤。9月中国外长钱其琛首次率中国代表团出席第十次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1993年11月江泽民主席成功地访问了古巴和巴西。1995年11月，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来华访问。中国与拉美各国领导人高层互访，不仅增进了相互了解，也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同拉美国家在经贸和科技领域合作的深入发展。

四、积极发展同东欧、中亚各国的关系

我们所说的东欧、中亚国家，指原苏联、东欧地区各独立国家。1988年至1998年，由于东欧巨变和苏联解体，我国在发展与这些国家的关系方面采取了灵活、务实的外交政策，积极推进了与各国在许多领域的合作。

1989年5月，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对中国进行了正式访问，同中共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举行了会晤，中苏两国关系在经历了30年的长期隔阂后，通过这一历史性会晤，结束过去，开辟未来，走到了一个新的起点。1990年4月，李鹏总理对苏联进行正式访问，双方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深入地交换了意见，签署了发展中苏睦邻关系、扩大合作的六个文件。1991年5月，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应苏联总统、苏共中央总书记的邀请对苏联进行了正式访问，访问期间签署了联合公报和《中苏国界东段协定》。苏联“8.19”事件后，中国政府本着不干涉别国内政、尊重各国人民选择的立场，先后正式承认了俄罗斯联邦和原苏联的其它14个共和国的独立地位，并发表了双边建交的公报。中国政府支持俄罗斯接替原苏联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席位，俄方承诺将继续履行前苏联同中国签订的条约、协定所规定的义务。1992年底，叶利钦总统正式访华，双

方签订了联合声明，确立了发展中俄关系的“睦邻友好，平等互利”八字方针。1994年9月，江泽民主席访俄，双方宣布建立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伙伴关系”。1996年4月叶利钦总统第二次访华，两国宣布发展平等信任、面向21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1997年4月，江泽民主席再度访俄，双方签署了关于世界多极化和建立国际新秩序的联合声明。同年11月，叶利钦第三次访华，中俄两国东段边界勘界问题得以解决。

中国政府在发展中俄关系的同时，也非常重视同原苏联地区独立国家的关系。1992年先后与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哈萨克斯坦、乌克兰、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亚美尼亚、阿塞拜疆、摩尔多瓦、白俄罗斯、格鲁吉亚、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等国建立了外交关系。1994年4月，李鹏总理访问乌克兰、土库曼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蒙古等五国，访问期间，李鹏提出了中国发展同中亚国家关系的四项基本政策：第一，坚持睦邻友好，和平相处；第二，开展互利合作，促进共同繁荣；第三，尊重各国人民的选择，不干涉别国内政；第四，尊重独立主权，促进地区稳定。1994年6—7月钱其琛副总理兼外长访问白俄罗斯、立陶宛和爱沙尼亚，阐述了中国政府对独联体国家和波罗的海国家的基本政策。这些国家的领导人也纷纷访华：1992年3月，乌兹别克总统卡里夫访华；1993年3月，塔吉克国家元首拉赫莫诺夫访华；哈萨克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先后于1993年10月和1995年9月访问中国；乌克兰总统克拉夫丘克和库奇马分别于1992年10月和1995年12月对中国进行了访问。继1996年4月在上海签署了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信任协定和1997年4月在莫斯科签署了边境裁军协定后，中国同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五国又于1998年7月在阿拉木图签署了关于加强多方合作的联合声明。我国同原苏联地区独立国家的友好关系更加巩固，双方在经贸、科技、文化等领域的合作也进一步加强和深入。

1989年东欧各国国内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波兰、匈牙利、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等国家制度相继改变，政权相继更迭。1990年10月3日两德重新统一。1991年后南斯拉夫原有的六个共和国中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马其顿和波黑共和国相继独立，塞尔维亚和黑山两共和国组建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尽管东欧发生了剧变，中国政府仍然与东欧各国保持和发展正常关系。东欧各国朝野各党派普遍重视对华关系，双方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各方面的交流与合作不断开展。

五、重视发展同发达国家的关系

1. 中美关系

中美1979年1月1日建交以后，两国关系经历了十年大体较为平稳的发展，两国领导人之间保持了互访和接触，各个具体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也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进展。但是中美关系始终存在着困难和障碍，美国政府和国会在美台关系、所谓人权和西藏等问题上干涉中国内政，使中美关系遇到严重困难。

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后，美国政府多次发表干涉中国内政的声明，并率先对中国实行“制裁”。美国国会也通过反华法案，借人权问题干涉中国内政。1992年9月2日，美国公然违反两国于1982年达成的“八·一七”公报，决定向台湾出售150架F-16战斗机。1993年7月，又无中生有地指责中国“银河号”货轮载有化学武器，肆意干扰该货轮的正常商业航行。美国还在一年一度的所谓“人权报告”中，攻击中国“侵犯”人权，并操纵一些国际势力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会议上抛出反华提案。1995年6月美国政府允许台湾当局的李登辉访美，动摇了中美关系的基础，引起两国关系的倒退。对于美国政府上述严重违反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精神的行为，中国政府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1993年11月，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在西雅图会议上与美国总统克林顿正

式会晤，就中美关系的改善和发展进行了协商。1994年11月江泽民主席与克林顿总统在雅加达会议期间再次会晤，就“建设性的新型关系”举行了会谈，江主席提出了指导今后中美关系的五项原则。1995年10月24日，江泽民主席与克林顿总统在纽约再次会晤。江主席强调，影响中美关系最重要、最敏感的问题是台湾问题，构成中美关系基础的三个联合公报的核心问题也是台湾问题，中国不希望再发生两国关系稳定发展受到干扰的事件。克林顿总统表示，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不是孤立、对抗和遏制，而是全面的建设性接触，美国要与中国发展建设性的伙伴关系。1997年10月26日至11月2日江泽民主席应邀对美国进行了国事访问，两国领导人就努力建立而向21世纪的建设性战略关系达成了一些共识，并发表了《中美联合声明》。1998年3月美国政府决定不再在日内瓦联合国人权会议上提针对中国的人权议案。1998年6月25日至7月3日，克林顿总统对我国进行回访，中美双方就许多重大的国际问题和双边关系问题达成共识。中美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2. 中日关系

1972年9月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两国关系取得了迅速全面的发展，各领域的交流与合作日益加强。1989年北京政治风波后，日本参与了西方对我国的“制裁”，使两国关系一度处于停滞状态。1991年8月日本首相海部俊树访华，中日关系完全恢复正常。1992年4月，江泽民总书记应邀访问日本，强调中日友好合作的潜力巨大，两国关系将在更高层次上向纵深发展。1997年9月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访华后不久，李鹏总理于11月又访问了日本，提出今后发展中日关系的五项原则，强调中日两国要着眼未来，努力构筑面向21世纪的睦邻友好合作关系，互利互惠，发展经济合作，并不断地用正确的历史观教育和引导年轻一代，使中日友好代代相传。据统计，中日两国的双边贸易额1996年已达600亿美

元，约是 1972 年的 60 倍，日本连续四年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然而，中日经贸合作迅速发展的同时，政治关系方面仍存在一些问題，在台湾问題、日军侵华、钓鱼岛的领土主权归属、美日政治军事同盟关系等历史与现实问題上，日本国内的右翼势力不断制造摩擦，严重损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因此，中日关系的发展道路是不平坦的，仍需双方做出更大的努力。

3. 中国与欧盟及世界其他发达国家的关系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十分重视发展同欧盟及其他发达国家的关系，积极在政治、经济、文化各领域发展同这些国家的合作。然而 1989 年北京政治风波之后，双方关系程度不同地出现了困难和曲折。其原因在于这些国家的政府不顾事实，不顾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对纯属中国内政的事情横加指责，并对中国进行“制裁”，多方施加压力。中国政府从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出发，理所当然地坚决予以拒绝。1991 年中国与西欧各国的关系才逐步走上正常发展的轨道。英国首相梅杰和意大利总理安德列奥蒂以及英、日、法、意等国外长先后访问了中国。1992 年 12 月，德国联邦议院通过了实现德中关系正常化、取消对华制裁的决议，西欧国家继续改善和发展与中国的关系。绝大多数西方国家已恢复向中国提供发展援助、出口信贷和商业贷款，西方国家在华投资也在不断增长。1994 年 9 月，江泽民主席应密特朗总统的邀请对法国进行了正式访问。这是 1989 年以后中国国家元首对西欧大国进行的首次访问。在法国，江主席发表了中国发展同西欧国家关系的四项原则：第一，面向 21 世纪，努力发展长期稳定的友好合作关系；第二，相互尊重、求同存异；第三，互补互利，促进共同发展；第四，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磋商与合作。这四项原则受到法国和西欧各国的重视。1994 年 11 月，加拿大总理克雷蒂安率领有众多企业家参加的代表团访华，积极在具体的经济领域同中国进行合作。1995 年 10 月，钱其琛副总理兼外长应邀访问英国，